

總括 中日文化交流研究的新展现

——略谈参会后的感受与思考——

赵建民

2011年5月27-29日，由日本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主办、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协办的“江南文化与日本—资料·人际交流的再发掘”学术研讨会，也是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又一次“海外专题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本人有幸应邀与会，其间主持了历史专场的报告和讨论，在会议最后的综合评论时也作过一个简短发言。会议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会议重在资料和人际交流的再发掘，会上的报告者多数能围绕中心议题，观点鲜明、见解独到、论述精辟、论据充分，富有学术价值，确是一次非常有成效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此，略谈与会后的感受和思考。

一

“江南文化与日本”虽不是一个新鲜的议题，早在好几年前就以同样议题举办过国际学术研讨会，但这次研讨会以“资料、人际交流的再发掘”为中心，确实颇有新意，从传统的“传播与接受”的视角延伸为突出“双方互动”的态势。会议不仅重视资料和人际关系的“再发掘”，而且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发人深省。

复旦大学陈正宏教授“十九世纪中叶日本画家田结庄邦光在上海游历——及其与沪人笔谈资料——”的报告，就是他在大阪府中之岛图书馆“玄武洞文库”中发现了日本画家田结庄邦光当年游历上海、武汉的日记原本，以及与上海等地士绅笔谈的原稿所写成的，证实了田结庄邦光所见近代上海见闻诸事的真切、生动和具体，确不多见，成为研究近代上海的第一手资料，无疑是极为宝贵的。

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榎本涉准教授“元末江南の士大夫層と日本僧”的报告，阐释前近代中日交流频度很高的宋元和明清两个时期的共同点和相异点，指出前一时期的日本禅僧来中国后因长期在寺院里生活，故将自己的亲身体会到的中国文化带回了日本，有着独有的特征，而后一时期因来中国的日本禅僧还能与其他士大夫阶层的俗家人保持交往，因此他们带回日本的除禅宗之外，还有诸如书画、诗文、医学、儒学、饮食文化等丰富多样的中国文化。

南京大学范金民教授“清代中日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的报告，以中日长崎贸易商品结构的不断变化为例，阐明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既是日方实行“正德互市新例”后的必然结果，又是中日两国间各自商品生产关系发展的直接反映，也是中日两国经济发展和生活时尚要求的反映。

中国美术学院郑巨欣教授“从夹缬的东传及流变看江南文化与日本的渊源关系”的报告，

阐释始于唐代的夹纻工艺，早在8世纪中叶就传入日本，在日本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但后来中国将夹纻改称为“夹板染色”，则可能是因受到了来自日本的影响，而以往的研究似乎认为传入日本的夹纻与江南无涉，但近年来的研究进展正呈显出江南文化与日本之间在夹纻工艺交流方面的密切关系：传入日本的夹纻，其源头应在浙江一带。

台湾大学徐兴庆教授通过对张德彝的《航海述奇》的介绍，描述张德彝（1847-1918）这个近代中国最初的英文学生、思想启蒙者以其摄取种种西洋文明、日本文化以及他自身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经验，从而写就了《航海述奇》等约200万字的浩瀚文献，探讨了张德彝对异文化的认识和思想变迁，进而阐明其作为“他者”有关中国近代化的文化异说，从研究视角上一改以往“双向交流”为“众向多元交流”，致使人际交流研究更为深入和拓展。

仅从例举上述会议上的报告，可以看出从传统的“传播与接受”延伸到“双方互动”，中日交流的动态确实有着变化，但在古代主要是日本向中国学习，而到近代中日文化关系出现“逆转”，主要是中国向日本学习的这一基本格局仍没有变化，当然也并不意味着古代日本向中国学习的过程中也有日本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在近代中国向日本学习的过程中仍有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然而，迄今为止尚无足够的史料和充分理由来予以改变中日文化交流原有的这个基本格局，这也是我们今天在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时所应持的认识和态度。

二

从上世纪以来，中国江南学研究俨然一个富矿，吸引着不同学科的众多学者的发掘开采。仅以史学领域而言，由于中外学者联手已取得了江南学研究的可观成果，其中美国和日本学者的研究也极为瞩目。由此可见，中国江南研究已趋于国际化。日本的海洋史研究、中国的海外交涉史研究也已有不少成果。在日本对其自身的研究，已突破了“一国史观”，而置于东亚的视野中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此次“江南文化与日本”研讨会，凸显东亚海域史研究，可谓是会议的亮点之一。鹿儿岛大学高津孝教授“萨摩塔と碇石—浙江石材と东アジア海域交流”的报告，以岩石学的分析和岩石学专家的肉眼和放大镜的观察，将分布在鹿儿岛、长崎县、佐贺县、福冈县的20余座被称为“萨摩塔”的中国式石塔，确认其所使用的石料采自中国浙江宁波郊外的梅园石，以及在宋元时期中国船的锚石残留在日本70余件遗物中，足以说明宋元时期浙江船所能到达的日本诸多地区。显然，这些残留日本的中国产石材所制造的物品，成了东亚海域交流史新的资料。

神户女子大学山内晋次准教授“日本史とアジア史の接点——硫黄の国际贸易を中心——”的报告，据古籍记载，鹿儿岛的硫磺岛将硫磺经九州西海岸到达博多，再从博多经由宋朝海商的贸易船运往中国，并与同时代的东南亚和西亚也有经海路贸易将硫磺运往中国的历史事实作了比较，即以硫磺的国际贸易为素材，探讨了日本史和亚洲史的关联。

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伊东贵之教授“日本における东アジア海域交流史研究の現状と動向”的报告，详细回顾了研究史，并就近年来共同研究的课题和动向，尤其是以日本人文科学领域中以其大规模的共同研究项目而广受关注的文部科学省的科研资助项目“东アジアの海域交流と日本伝統文化の形成—宁波を焦点とする学際的創生—”（通称“にんぶろ”项目）的研究宗旨和成果为中心作了若干介绍（与会的日方学者在会前专门安排了对宁波的学术考察）。该项目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参与的人数多达137人，意在探讨在东亚海域圈内日本文化历史起源的再构成，并力图成为日本研究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最高水准。该研究项目

至今已展示出了多元网络的错综复杂样态，从而使海域交流史的研究充满了生气。日本学者能克服以往的“一国史观”和“一对一交流”的样态，而以海域史的范围进行多视角、多领域、纵横分析来对日本文化传统形成过程的再探讨。该课题组代表东京大学小島毅准教授主编、予定共20卷的《東アジア海域叢書》已由汲古书院刊行中。

日本学者正在进行的东亚海域史研究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思路，显示了日本学者在日本史、中国史、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创新举措，并已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果，这很值得中国的中国史、日本史、中日关系史的研究者们关注，有必要进行中日学者之间保持相互的沟通和交流。

三

这次“江南文化与日本”研讨会上所发表的报告有新课题的研究成果，也有老课题焕发出了新意之趣，确实在探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取得了可喜成果；然而，如果从更全面更深入的角度而言，似乎尚有着研究课题的继续拓展空间。这次研讨会上涉及战争时期跟战争有关的议题只有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细川周平教授“戦前の中国趣味の流行歌”的一个报告，他认为电影、文学、艺术等大众文化在战争时期也曾被国家动员，承担了鼓动群众的民族意识、战斗意欲和敌忾心，以及抚慰颓废生活的作用；歌曲也是被动员的文化之一，在15年中日战争中，出现了许多与战争相关的歌曲，其曲调和内容可谓纷繁复杂，如1938年以后出现的“中国趣味”的《苏州夜曲》等歌曲，报告者经对旋律、编曲、歌词、与媒体关联等的分析，探讨了日本大众对于其想像并欲求的他者形象的形成和发展。以中日战争时期的文化题材来探讨“中日文化交流”，这对开展“江南文化与日本”的研究也值得效法和若干有益的启示。

中日文化交流在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二千多年时间里，主流是友好的，但在古代直至甲午战争也发生过7次中日交战，连同现代时的15战争，尽管战争没有象英法之间“百年战争”（1331-1453）那样漫长，但确实中日间的战争无论在古代还是近现代均对中日两国的社会发展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关于中日文化交流史，笔者曾作过十六个字的概括：渊远流长、根深叶茂、（在吸取欧洲文化过程中）互为桥梁、（无论是友好还是交战时）始终不断。这是中日文化交流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基本特征。但因中日间有过多次战争，致使中日文化交流呈现出自由与不自由、平等与不平等、友好与非友好的态势。假若对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进行全面考察，大体可归纳出其有着三种渠道：1是通过官方派遣使节、留学生、文体歌舞团队、书籍以及彼此的礼尚往来的“通常渠道”；2是通过彼此开展的宗教和贸易活动，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3是战争和掠夺也是文化交流的“意外渠道”，15年中日战争中，日本从中国劫掠去的图书文物就是印证。这三种渠道或途径显示了中日两国间文化交流的普遍性、必要性、偶然性。也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也是一种文化交流”，估计是不会错到哪里！因此，在研究中日文化交流时对战时的“文化”课题是不能忽视而须加以充分重视的。

另外，中国近现代史上存在着与日本有着密切关系的社团，数量众多、活动频繁、影响深远，它们对推进中日文化交流起过重要作用。例如，由陈去病、柳亚子、高旭等人创办于1909年、存续到1937年的“南社”（社名取义于“操南音不忘其旧”、“钟仪操南音，不忘本也”），它不仅是一个革命文学团体，而是一种历史的文化景象，既有传统色彩又有近代特点的社团。

先在苏州成立后迁往上海（今在苏州和上海张堰镇设有“南社纪念馆”），在绍兴、沈阳、广州、南京设有分社，素有“文有南社、武有黄埔”之誉称，活动遍布海内外，会员总数多达1180人，囊括了大半个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据统计，清末民初中国人在日本创办的报刊杂志有24种，其中由南社成员所办的就有9种，它们对中日关系、中日文化交流颇有影响。显然，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对类似“南社”这样的社团及其有关的人物、事件、报刊等等应视为一个不能忽略的研究课题。